

75
1945-2020

出身印尼的首位华侨市长

石琪高历尽坎坷业绩辉煌(下)



原柳州市市长石琪高

生中不搞反“右”后来学生中也搞了,当时的“反右斗争”就这么逐步的扩大化了。

清华大学的反“右”扩大化先从教授开始。有位数学教授课讲的非常好,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了这个教授已经是“右”派了。要求学生只能听他上课,课前不准起立,也不能给他鞠躬,他不准给学生鞠躬。特别可怜的是这么一位老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讲了一句话,说苏联进口的机器太笨重了,就是讲了这么一句话便被打成了“右”派。

在最初阶段,我还是反“右”的积极分子,当时批斗钱伟长老教授我也很积极的。我记得,在“反”右运动中“中国青年报”还刊登了记者采访我时我讲的一句话:“‘反右派斗争,是一种清醒剂’。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师

被批判,我觉得这个事情搞得太过分了,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当时整个反“右”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就在这个当口提了意见。我说党不能对运动放任不管,要出来抓一抓了,有这么多被打成了“右”派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运动把学校的秩序都搞乱了。于是有人说我反党,说我对反“右”运动有看法,有不满,这是我的一条罪状。在被打成“右”派前,我是土木工程系学生会体育部的部长,也是黑板报的编辑,会经常给黑板报和校刊写些文章。得到的稿费我都慷慨地请大家吃一顿,这件事情后来也算是我的一条罪状,说我用资产阶级的金钱腐蚀同志。现在看起来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可当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

没过多少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1958年2月4日立春那一天,我们宿舍和走廊里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人通知我,今天你就不要去上课了,也不准外出,就在房间里呆着,准备接受批判,就这样我成了“漏网右派”。

本来我还有个弟弟、两个妹妹在印尼,1952年就我一个人回来了,全家人都不同意我回国,只有父亲还比较支持我。1960年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也都回来了,当时印尼排华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城市并没有波及,他们完全可以不回来,是我把他们动员回来的。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1958年10月份开始我每月才拿二十七块五,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回来以后根本无法生活,就把带回来的三部单车给卖了,后来为了生活又把所有的金银珠宝都卖了。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很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幼稚,我认为这是党对我的考验,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就是在那种情况,我对党也没有二心,还是动员我弟弟妹妹回国,他们回来后看到我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也很不理解我,说我是个骗

子。1964年我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去了香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回不了印尼,只能呆在香港,他们跟别人讲都是说:“回国被我哥骗了。”在那种情况下我真是说不清楚,他们不理解我也是有道理的。我的眼泪只能往肚子里流。人最伤心的事情是不被理解,特别是不被亲人理解。

我当时回国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印尼不是我应呆的地方,我要回到我的祖国。我动员华侨回国也是讲这个道理,只有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的新中国才是我们自己的家。我动员他们回来,他们回来后都吃了很多的苦,他们也是到处骂我,也说是我把他们骗回来的。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父母我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情,也从来

没有讲过我拿多少钱。而我的母亲在印尼那边宣传的却是我在国内拿的工资是中上等的工程师水平,我过得很好,弟弟妹妹回来跟我过肯定会很幸福。1953年我考上清华大学,在这之后不断地写信回去,父母每次收到我的信都非常高兴,我寄回去的照片把家里都贴满了,他们想以此方式来告诉周围的人,我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他们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跟他们讲毕业后我每月只拿27.5元的事吗?我能讲我被打成“右”派了吗?我能说祖国已经把看成是“阶级敌人”了吗?如果我这样讲不就是对祖国的污蔑吗?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不敢跟亲人讲,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未完,下期待续



柳州领导看望老领导石琪高